

中苏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启动

高慎淦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还缺乏大规模建设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学习苏联经验自然是首要的选择。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思路便由“向苏联学习”转向“以苏联为戒”,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代表性理论成果。

关键词: 中苏论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90X(2012)4-124-03

作者: 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湖南,长沙,410083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一次结合”,并最终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实践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二次结合”是什么时候启动的?怎么启动的?

一 从革命胜利后到“第二次结合”前的现实选择“照搬苏联”

在新中国建立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①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首先面对的是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的现状,这也使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成为共产党急需解决的问题。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中苏结盟后又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给新中国以大力的支持和援助,对于还缺乏大规模建设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学习苏联经验自然是首要的选择。毛泽东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②。刘少奇也强调:过去中国人民的革命就是学习苏联,今后我们要建国同样要“以俄为师”,“要学习苏联,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技术上,在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要学习苏联”^③。周恩来更是指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五年来的无数事实都表明了伟大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榜样,正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向苏联学习的光荣任务。”^④从此,“向苏联学

习”的热潮席卷神州大地,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与经验成为中国共产党全党的共识。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超额完成,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建立,也标志着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对苏联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模仿,形成了一个高度集中统一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后来毛泽东说“全国解放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七年……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⑤又说“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⑥毛泽东当时认为“苏联政府根据它三十多年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对于我国五年计划任务提出了各项原则的和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将帮助我们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尽可能地避免许多错误和少走许多弯路。”^⑦

刘少奇也有同样清晰的表达“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⑧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如此,文化方面亦如此。对于正在起步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来说,由于没有经验和意识形态、国际局势的制约,以及恢复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也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有些也是很好的,中国当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学习和引进苏联模式是必要的,对中国短期内建设起强大的工业、国防和科学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提高,面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复杂性的复杂性,带有浓厚苏联模式印记的中国计划体制的弊端便逐渐显现出来。随着外部环境的相对改善,特别是苏共二十大“揭开盖子”大大减轻了我党的某种“精神压力”之后,“以苏为戒”思想的产生就水到渠成了。

二 “以苏为戒”——“第二次结合”的前奏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错误及其严重后果是有思想准备的,原则上也是赞成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明摆着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⑨苏共二十大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同苏共领导人的内部会商和谈话中,几次表示我们不同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观点。中共中央在写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多次提到“目前我们同你们的分歧,……始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⑩苏共二十大是中苏论战的起点,引发中苏两党意见分歧的是“和平过渡”与斯大林问题,实质上是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斯大林评价问题是中苏论战最直

接的起因。

薄一波的回忆说“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发生的事情……,已使中共中央陆续觉察到斯大林和苏联经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⑩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有诸多不满,虽然苏联模式的弊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开始显露,东欧一些兄弟党的社会主义改革潮流正在兴起,但因为我们严重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及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的正统性,我们不能不仍然将苏联模式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照搬。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和苏联经验中的缺点和错误,也就暴露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从而“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⑪。这就提供了突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新契机,不仅有利于苏联党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得到更快更好的学习,也使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有可能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痛苦经验中学习真理,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根据本国实际建设社会主义,启动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独立思考。

斯大林是列宁逝世以后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者,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主要缔造者与代表人物,他的错误自然就是苏联经验与苏联模式中的缺陷。毛泽东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⑫从此,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思路便由“向苏联学习”转向“以苏联为戒”,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苏为戒”是直接针对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而提出来的,但这不是否定学习苏联的必要性,而是要求善于学习苏联。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结合。”^⑬即使是“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致失败”,“波匈事件的发生就是照搬苏联模式的后果,现在各国执政党面临的学习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同本国实际结合起来,不要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讲辩证法,不分析,……片面地看问题,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当搬的东西也搬来了不少。那些搬得不对,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东西,必须改过来。”“以苏为戒”就是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不要再“照抄”苏联的经验,可以说是“学习苏联”的提升。

三 中苏论战启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第二次结合”

在中苏论战初期,毛泽东从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历时43天的调查研究,共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之后,同时多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4月2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重点讨论了经济问题,也涉及与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一些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好。”^⑭毛泽东在总结建国以后的历史经验时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

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⑮“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⑯《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开始,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开篇之作。邓小平曾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⑰

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精神,1956年9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着重分析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国内主要矛盾与党的主要任务的变化,提出了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情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决定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某些改革。鉴于斯大林错误的教训,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⑱所以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密切联系群众,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反对突出个人、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全面贯彻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由于苏联模式的弊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逐渐显露,所以八大还提出了初步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陈云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的发言中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建议。这些思想既是“以苏为戒”的结晶,也是“一五”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在一定层面上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认识,可以说是具有一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步构想。

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上反苏反共潮流涌起,在国内某种因素的影响下,从1956年9月起至1957年春天,中国也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请愿事件,一些地方还相继出现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面对1956年秋冬国内一些地方出现的“闹事”风潮,毛泽东认为引发这些事件的原因“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上或经济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⑲。但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其中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是苏共二十大及其引起的巨大震动,使毛泽东更加认识到能否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仅关系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而且关系到人民政权的生死存亡,因而更加深入地分析、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1957年2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便是这种分析、思考和研究的结果。后来经过整理、修改、补充,吸取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相关思想,于同年6月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公开发表。文章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类具体矛盾中,主要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革命时期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各民族关系上要实行民族平等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方针,在经济工作中要实行统筹兼顾的方

针。这篇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的著作,科学地回答了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问题,形成了具有系统性和独创性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代表性理论成果。集中体现了中苏论战期间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发展进程中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进程中,随着《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决议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步步深入,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也提出了一些富有创造性的构想。中共八大在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要转移到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突破苏联政治模式,提出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应同各民主党派建立社会主义的互助合作关系。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力图克服苏联文化体制的弊端,制定了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科学技术的“双百”方针。上述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路和构想,在一定程度上革新了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具有崭新的内容和民族特色,这是在中苏论战影响下启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最初成果。

参考文献:

-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 ②《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 ③《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 ④《周恩来在苏联驻我国大使尤金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

1954年10月1日,《新华月报》1954年第11期

⑤《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9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91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⑦《毛主席感谢苏联援助我国经济建设致马林科夫主席电》,《新华月报》1953年第10期。

⑧《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⑨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12页。

⑩《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来往的七封信》,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页。

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2页。

⑫⑬⑭⑯《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23、42、370页。

⑮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18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页。

⑰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6页。

⑱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1975年7月13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6页。

⑲《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

⑳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郑谦《延伸与准备——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

(责任编辑:唐昌福)

(上接169页)

打倒呆板僵硬的文言文,建立白话文学;一边是为了打破英国文学的屏障,从英国文学中分离出来,建立属于自己的诗歌和文学。仅从相同的历史使命和历史地位上来说,胡适受到惠特曼自由诗体的影响是必然的。

四 结 论

中、美诗歌创作之相应是相互的,^①惠特曼诗歌创作是中美诗歌相互影响的重要力量。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惠特曼与中国初次结缘的时刻,这位世界公认的“民主诗人”,几乎是与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的五四运动同时在中国出现的。本文通过对田汉、郭沫若以及胡适在“五四”时期对中国新诗的影响,窥探出美国诗人惠特曼,其民主思想、豪放诗风和“自由体诗”的创作为正在转型中的中国新诗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当人的意识、民主生存、社会问题汇聚在一起,便会产生三种不同的文学追求:启蒙、救亡、革命。所以在“五四”的社会大背景下,在前期觉醒的知识分子那里,人的观念发生变动,人逐渐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平民意识不断加强,人的自然天性受到尊重,平民而非贵族,自然而非天理,构成人的观念架构的基本立场与趋向。中国诗歌也随之开始了相应的

发展。鉴于目前国内还未有针对惠特曼对中国某一特定时期中的特定人群产生的影响的类似研究,所以本文为惠特曼的研究提供了更雄厚的实践依据,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提供理论平台,同时为促进美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注:

① 田汉《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少年中国》创刊号。

②《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③《序我的诗》,见《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0页。

④《论国内的评谈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

⑤《论接受美学范式下近代中国对惠特曼的接受》,见《求索》2011年第3期,第217页。

⑥ 黄维樑《五四新诗所受的英美影响》,《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第125页。

⑦ 王峰《中国诗对美国诗歌创作的影响》,《求索》,2011年第3期,第218-220页。

(责任编辑:群 喜)